

■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

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

[美]第默尔·库兰 著

丁振寰 欧阳武 译 / 欧阳武 校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TIMUR KURAN

长 春 出 版 社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

[美]第默尔·库兰 著
丁振寰 欧阳武 译
欧阳武 校

長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 / (美) 库兰编; 欧阳武, 丁振寰译。—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5.5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书名原文: Private Turth, Public Lies

ISBN 7-80664-963-8

I. 偏... II. ①库... ②欧... ③丁... III.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8180 号

责任编辑: 张耀民 封面设计: 郝威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by Timur Kuran
Copyright © 199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 邮编: 130061)

(网址: [Http://www.cccbs.net](http://www.cccbs.net))

业务电话: 8563443 发行电话: 8561180

长春大图视听艺术传播公司设计制作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302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依照经济学家第默尔·库兰的观点,偏好伪装是指在认识到社会压力的条件下,不如实地展现自己的想法。在《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一书中,库兰讨论了不仅是无所不在的,而且具有重大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现象。通过综合多种学科理论(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理论),库兰提出了偏好伪装是怎样形成集体决议、东方世界的结构变化、维持社会稳定性、歪曲人类知识和隐藏政治可能性等理论。

第默尔·库兰(Timur Kuran)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同时他还是伊斯兰教思想和文化研究的核心人物。

库兰这本书的成功应归因于作者的坚持、不寻常和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之中令人耳目一新,人们的选择和欲望都不是固定指定的,而是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的函数,首先,被另外一些人施加了压力。

——凯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它最终解决了一系列一直被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学者讨论的、但大部分都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库兰把这些学科的见解综合成一个行为模型,这一模型推进了许多前沿问题的讨论。

——罗伯特·H·弗兰克(Robert H. Frank)

这是一本煽动性的、充满激情的著作。通过对各学科见解的综合,《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寻求表明偏好伪装怎样形成社会行动、歪曲真理、抑制变化和突发性革命……其各学科间的见解阐明了大量的社会现象、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

——劳伦斯·R·伊安纳内(Laurence R. Iannaccone)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编委会

主编
编委

秦 海

马春文

张 平

路 风

张宏俊

冯 军

张晓晶

陶修明

张颖新

吕传俊

周汉华

王维德

余 晖

唐寿宁

刘 杰

张昕竹

高世楫

吕 鹤

《新政治经济学译丛》总序

秦海

我始终坚信，在学术界发生的事情，对思想观念的发展和传播，以及最后对这些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詹姆斯·布坎南（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一直是被不同学者所使用、而不作出严格定义的一个术语，在不同学者的心目中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性的认同^①。同时，新政治经济学也常常与政治经济学相混用。

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对于那些对个人的成长经历赋之于回忆或期望的人而言，在他们的成长的岁月中，所接受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就是政治经济学，而且这是一门被称之为研究生产关系的学问。

按照经济思想史家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石，或者称之为是社会科学的皇后。据说，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产生于17世纪的法国，蒙特克雷蒂恩（Montchretien）在1615年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在英语世界的文献中，詹姆斯·斯图亚特（John Stuart, 1761）是撰写《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第一位经济学家，并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专著的书名。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思想传承中，存在着两种相互连接的思想来源：一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另一种面孔是十九世纪的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它们所致力之经济学一直被描述为政治经济的科学和经济治理的艺术。前者的目的是描述经济运行，后者的目的是识别治理经济的规律，并将之转化为经济政策（Mary S. Morgan, 2001）^②。根据英

^①2005年1月8日下午两点，我在撰写这篇总序的时候，从google.com这一常用的搜索引擎上，键入new political economy，仅用了0.23秒就显现了1520万项与“new political economy”相关的条目；如果再键入“新政治经济学”汉文这一词条，搜索所有的中文网页，其相适配的网页也达到17万项。

2 总序《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国爱丁堡大学经济学系高级讲师斯图尔特·塞耶尔 (Stuart Sayer, 2000) 《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一个总括》一文中的看法, 在 18 世纪到 19 世纪, 甚至到 20 世纪, 经济学经常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 “这一术语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流行看法, 即经济学与政治学是紧密联系的, 政治因素在决定经济后果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 作为丛书的编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按照塞耶尔的说法, 20 世纪 50~70 年代, 在新古典经济学所驱动的——至少在局部——为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更加严肃的科学基础的过程中,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效用和生产函数、市场互动的约束条件确实成为经济分析的重心, 但是, 在这一过程中, 政治约束确实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只不过经常是松散的和不得要领的, 并且在某些文献中, 经常被称之为具有“右”派或“左”派的倾向, 直至肯尼思·阿罗 (Kenneth Arrow, 1963) 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邓肯·布莱克 (Duncan Black, 1958) 的《委员会和选举的理论》以及詹姆士·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 (James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的《同意的计算: 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等经典著作出版之后, 政治经济学才有了“新”这一定语。

新政治经济学崛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早期。除了包括上述的人物之外, 按照塞耶尔 (Sayer, 2000) 的说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诺德豪斯 (Nordhaus, 1975) 和希布斯 (Hibbs, 1977) 关于机会主义和政党政治商业周期的理论、凯德兰得和普雷斯科特 (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 以及巴罗和戈登 (Barro and Gordon, 1983) 关于时间不一致和名誉的理论, 以及滨田和幸 (Hamada, K, 1976) 关于货币政策的国际相互依赖性分析, 斯蒂格勒和波茨纳关于管制的分析以及克鲁格、巴格瓦提、斯尼瓦山、布坎南、托利森和图洛克等关于寻租社会的分析等^②。因此, 崛起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 其“新”在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把政治过程纳入了分析对象, 而且直接与“弗吉尼亚

①Morgan, Mary S. (2001):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Economics: Engineering and Ideology, Working Paper No. 62/01,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pdf/wp6201.pdf>

②Stuart Sayer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2000.

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有关。

新政治经济学“新”的第二方面是，旨在打开经济政策形成的“黑箱”。在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政策的形成经常将经济政策决策看成是一个黑箱，在理性人或者是经济人行为的最优化中，政策工具和制度设计经常被自觉地作为外生变量来看待，或者是被排除在经济分析的范围之外。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说明性的阐述，政策决策者经常被看成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社会计划者，他追求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他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和无效率状态进行直接干预，在这样的分析中，这种干预可能导致的资源配置的再扭曲、棘轮效应等等都被舍弃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这种分析方法，自然有它的优点，起码从读者的立场看，不存在政治学的阴暗面，而且领会不到制度设计的细节和意识形态的包袱，有助于形成更加技术化的经济分析的风格和模式。实际上，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无论制度背景如何，大量存在着“创租”和寻租的行为，一种政策的后果经常超出了决策者的意料之外。打开政策形成的“黑箱”不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更可能是“叶公好龙”或者是政策形成过程本身所内植的“皮克马利翁”效应。

20世纪80年代是新政治经济学最为活跃的年代，根据旅美以色列经济学家艾伦·德拉正（Allen Drazen, 2000）的说法，“政治经济学是当今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不仅在宏观经济学上有所体现，而且在经济学的一般领域都是如此”。^①在这里，他实际上指的就是新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定义就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互动研究”，尽管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含糊的定义，但是，它具有良好的“包容性”。因此，从德拉正的观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不同于公共金融、公共经济学以及公共选择，因为它关注的经济决策的政治性质以及在一个社会中政治行为如何影响经济选择，而社会被定义为不仅包括特定主权的国家，而且包含了具有一定管辖权的组织，比如企业、社群或其他组织。从这一点上来看，新政治经济学“新”的第三个方面是，政治学和经济学所处理的研究对象都可以纳入到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来，而且可以对一些特殊的概念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权力”、“权威”等

① Allan Drazen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 总序《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等。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权力是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能力；权威，也就成了一个人、几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明显地或者默认地认可某个人为他们在某些行动领域做出决策的状态。信息、知识、激励等理论这些在主流经济学发展中所获取的革命性发现也就被纳入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来源。20世纪80-90年代的新政治经济学也就顺理成章地包括了民主和政治权力的度量、新闻自由、人权、法院的独立性、产权保护、法律和司法制度的透明度、犯罪、腐败以及社会和政治暴力、政治不稳定等等方面的研究主题（Sayer, 2000）。^①

新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为了复兴经济思想史中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而是为了获得社会科学的突破。1996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创立了《新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New Political Economy*）。其创刊词写道：“托克维尔曾经断言，新世界需要新科学。从现代的意义上看，新世界不仅表现为世界经济的新的的发展，而且表现为一种全新的世界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些方面的发展和构成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接着这份创刊词继续写道，“理解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世界经济发展的结构，需要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以便为清除智识上的障碍做好准备，并需要把不同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新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将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广度和睿智与20世纪社会科学的分析性进展联系在一起”。绝大多数20世纪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是按照“两分法”展开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即国家与经济、经济行为者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等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从公共领域看，或者说在政治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制度就是国家；在私人领域，或者说在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的就是市场。新政治经济学把这些“分离”的两者融汇了起来。

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新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之处，就是它与新制度经济学相互包容和互为促进。目前，在中国学术界，新制度经济学已经为大家所熟悉，提出这样的看法未必能够得到一致性的认同。约翰·道巴克和约翰·奈耶（John N. Drobak and John V. C. Nye, 1997）主编的《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的入选论文就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而且在前言中，他们也指出，交易成本与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

^①Stuart Sayer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2000.

经济史（通常以制度和微观经济学作为理论背景）、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等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沿性论题。当然，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实证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中所进行的理性决策研究（Jams E. Alt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90），甚至干脆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蒂莫西·拜斯莱（Timothy Besley）在2004年10月13日英国科学院的凯恩斯经济学讲座所作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文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理解政策领域所产生的重要问题。虽然在一些场合经常存在着这样的暗示，但是，它并不是经济学家们为了向政治科学领域扩张而进行的一种努力。相反，它主要关注的是将经济学家们的能力扩展到需要某些工具才能进行经济和政治决策的问题上。”^①20世纪经济学范式的履新、分析工具的进展（博弈论、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等），特别是“冷战”之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边界已经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能力，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回应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就正如贝斯莱所言，“新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扩展经济政策分析领域并因而强化它的相关性的学说”。就编辑这套丛书而言，我们的主张是，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决策者、学生以及对社会生活怀着强烈求真欲的人们，更需要理解政治行为、经济利益、社会矛盾、冲突和摩擦以及在各个层面所洋溢着的热情，这也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所在。

2005年1月10日·北京

主要参考文献：

Alt, James A.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90, edited: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sley, Timothy(2004):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http://econ.lse.ac.uk/staff/tbesley/papers/keyneslecturetext.pdf>

① Besley, Timothy (2004):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http://econ.lse.ac.uk/staff/tbesley/papers/keyneslecturetext.pdf>

6 总序《新政治经济学译丛》

Blinder, Alan S. (1999): Economics Becomes A Science-or Does I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April 23, 1999.

Drazen, Allen (2000): Political Economy in Macro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robak, John N. and John V. C. Nye, 1997, edited: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cademic Press.

Morgan, Mary S. (2001): The Foundation of “Morden” Economics: Engineering and Ideology, Working Paper No. 62/01,
<http://www.lse.ac.uk/collections/EconomicHistory/pdf/wp6201.pdf/>

Sayer, Stuart (2000): Issues in New Political Econom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 14. No. 5.

詹姆斯·M.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平新乔、莫扶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詹姆斯·M. 布坎南、戈登·塔洛克：《统一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英文版前言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把其中的部分章节送给一位学者阅读。他回信说，我文中的观点使人们对我的身世充满好奇，想知道我是否经历过集权统治。我告诉他，我过去一直生活在土耳其和美国，这两个地方从来没有受过极权主义的蹂躏。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更加深思熟虑的答案。尽管与土耳其相比，美国对言论自由原则的解析更宽泛，贯彻也更加一贯，但我自认为一直生活在能够容忍批评的国家里。在这两个国家里，在许多问题上，新闻舆论都能够展开辩论，对官方政策的批评也处处可见。与此相反，集权制度一直在迫害不同政见者。由于担心遭到官方的报复，潜在的批评者避免谈及他们的所思所想，也不会公开质疑政府政策，更不会公开批评政府、呼吁改革。正是这种无处不在的不真诚促使我的这位读者提出疑问。他想知道，如果我没有直接经历过极权主义，我对“偏好伪装”的成因就会理解甚少，也就不可能对“偏好伪装”的影响进行准确的评价。

但是，专制政府不是恐惧的惟一源头，也并非公开和公开演说的惟一障碍。一个更为本质的因素是公共观点。一方面，在没有公共观点支持（至少是默许）时，专制主义是难以维持的。另一方面，公共观点本身也是人们愿意表现其内心自我的决定因素。甚至在民主社会，在思考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得到官方保护，容忍被誉为美德的地方，非正统的观点也可能遭遇巨大的敌意。比如，在美国，如果你支持贫困妇女绝育或者支持象牙进口合法化，人们即便不会怀疑你心智是否健全，也可能会怀疑你的文明水平和道德水准。固然，法庭一次又一次的裁决，对那些不受欢迎的观点，无论它们多么让人难以容忍，都站在宽容的立场上加以保护。然而，一个受法律保护可以自由表达令人厌恶的观点的人藐视自己和表达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的人享有不一样的尊重的观念。无

2 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

论执行有多么严格，言论自由者都不能通过观点的表达来冒犯人们的名誉。

正是因为表达不同的观点时，人们得到的待遇不同，个人通常才会将自己的表达裁剪得能够适合社会的主流。随着社会压力的不同，调整的差异也非常巨大。有一种极端是没有任何坏处的，甚至说可能是有些好处的纯礼貌行为，如对一个穿上花哨衬衫的朋友说他很有品味。另一种极端的例子是没有骨气的行为，比如，当一位政治家明知，采取某种保护主义的措施将对本人支持者的多数有害时，他却表示赞同。产生上述不真诚行为的压力无需源自政府。所有的政治制度之中，无论是最严厉的独裁政权，还是最自由的民主政权，都存在着偏好伪装。

回到我同僚的质疑中来，无需生活在暴政下，偏好伪装是一种普遍行为。我的出发点是现代美国政治中的禁忌。我自己曾经多年沉溺于现代政治经济学，也让我的学生花费数年来研究经济发展和微观经济学理论。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些问题比另外一些问题更多地得以公开讨论，一些观点比另外一些观点更容易得到的宽容。当前的文献对此毫无认识，更不要说揭示和解析这一现象，这是目前这些文献的一个弱点。要找证据并不难，我们甚至无需走出校园：许多倡导言论自由的人，在强烈谴责 20 世纪 50 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为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提供讲台，比如，优生主义者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就在通常的排斥名单之内。

关于偏好伪装，我最早的两篇文章（形成于 1983 年，四年后在《公共选择》和《经济学季刊》中发表）寻求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经济理论和政治学带来一些现实主义的东西。随着思考深入，偏好伪装涉及社会思潮的各个角落变得非常明显。相应地，我的研究范围也扩展了，逐渐变成跨学科研究。

本书是一部理论著作，综合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而这些方法和成果或多或少来自于独立发展的社会科学传统。这个理论融合了经济学中优化和均衡的概念。也参考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将政治压力集团作为集体决策的关键角色来对待。同时，还采取了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把人类看成社会存在——相互学习、相互关照和担心别人对自己看法的生物。最后，按照心理学的各种学说，本书也认为，思想是有局限性的，精神也会产生紧张。在保持跨学科研究特色的同时，这个理论产生了体现某些观察的命题，这些命题在多个学科研究中已经不再见到。

所有的这些学科，包括哲学，都提供了对我称之为偏好伪装现象的观察角度。本书中，我试图调和和统一这些观察角度。我特别地寻求提供一

个关于偏好伪装在指导、扭曲、稳定、限制和改变社会秩序方面的角色的集成解释，包括加固那些活动的知识。不限于我描述和分析的个人机制（偏好伪装作为一种刚性之源、作为意识形态的塑造者、作为惊奇的摇篮），这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是在各种特定机制中建立的联系。

一本宣称分析一般社会过程的书，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环境检验，来证明该书主题的普适性。通过确定不同地理区域、时间跨度和文化特征的适用模式，把原先被认为是不相关的事实联系起来。本书中，我因此组织了两个案例研究，它们分别是印度的等级制度和美国的种族迫害行动。在这两个案例中，重点总是把各种各样的事实串联起来。同样的逻辑贯穿于所有解释体系，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普适性。选择这些案例进行研究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案例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支持本书论点的典型例证。

如果我只集中于一个案例，在某些人看来，更为详细的论述可能会使本书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但是这个理论的通用性将不能被很好地证明。这本书给人的印象就可能是，只与某个单一文化、社会或者历史事件相关联。当然，在印度和东欧文化之间，在分割和政治集权的系统之间，在古代宗教和现代世俗社会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我们能够既看到相似，也看到差异。事实上，研究差异可能会从研究通用的过程中得到好处。在差异迷惑人的地方，斯蒂芬·杰伊·古尔德说道，通用性常给人以启发和教导。任何见到老虎和豹子的人都知道，一种是带有条纹的，另一种是带有斑点的。通过采用通用理论，即自然进化论，可以对这个迷惑人的差异的起源和稳定性进行很好的解释。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逐渐分化的时代，一个专业学者要跟上其学科领域的发展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别的专业和学科了。对非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甚至更加难以处理。世界经济的逐渐一体化伴随着对非本土化知识的需求，然而，作为个人，我们都受到信息处理能力的制约。于是，存在着对大综合、概念化工具和模式研究的极大需求。正是出于这点，我才开展了现在的工作。我曾经试图解释一个通用现象。这些例子可能是自圆其说，但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是为思索这个机制、动态学和偏好伪装的结果开发出简单的框架。

偏好伪装是一种隐藏信息的行为，而这些信息正是主导社会趋势的一种潜在力量。读者可能想知道，这个理论是否具有预测价值，是否具有可批驳的暗示。在全部的主张得以充分地说明之后，我将回答这些问题。我对读者的要求是，先对这个理论的一致性和合理性进行判断，在

4 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

此之前，权且相信，在合适的时候，测度、测试和预测潜力的问题会受到关注。

当某人陷入对某个特定现象的研究中时，他必然会意识到应当在日常生活中验证他的研究。我发现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人类的虚伪和不真诚。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看到伪装偏好的迹象：在教工会议上、在社会集会上、在观察政治争论的时候、在新闻界、在我的学生的考试卷纸上、在我自己的行为中，我也开始逐渐觉察到这些现象。值得庆幸的是，我对人类本性中阴暗面的了解并非一无所获。我变得对人类的独立品德异常敏感，对人类敢于在压力下说“不”的勇气非常钦佩。在我理解了人性的复杂、理解了在协调社会认同和自我判断冲突中承受的压力之后，便对异议者、先锋、革新者、不同政见者甚至不称职的人有了更多尊敬。我希望读者能够与我一起分享这个认识。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许多组织和个人给予我帮助，使我获益匪浅。虽说不可能将他们的名字全部列出，但我不能省略那些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人。

我非常感激 Wendy Kuran（我的太太），她不仅一直是我创作激情的不竭源泉，同时也是我各种各样草稿的严厉批评者。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的同僚中，我特别感谢 Richard Day、Richard Easterlin、Peter Gordon 和 Jeffrey Nugent。作为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好奇心常常让我超越经济学的常规边界，而他们的热情又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环境，使我能够不断地追随着我的兴趣。这些年来，我也从他们的知识、建议和友谊中获益甚多。除我本校的同事之外，我还从 James Buchanan、Albert Hirschman、Mancur Olson 和 Thomas Schelling 那里得到了鼓励和支持，他们所撰写的那些开创性的著作对我的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这个项目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为我的草稿牺牲了很多时间，指出错误和帮助我清晰概念。我特别感谢 Lee Alston、Anjum Altaf、Arjun Appadurai、Randall Bartlett、Young Back Choi、Metin Cosgel、Dipak Gupta、Andrea Halpern、Robert Higgs、Sheila Ryan Johansson、William Kaempfer、Daniel Klein、Michael Krauss、Mark Lichbach、Glenn Loury、Thomas Miceli、Vai-lam Mui、Raaj Sah、Ekkehart Schlich、Wolfgang Seibel 和 Bruce Thomapson。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一些研究生也做出了有益的评价，我特别感谢 Tolga Koker 和 Enrico Marcelli。当手稿最终接近完成的时候，哈佛出版社编辑 Michael Aronson 提供了合理的编辑调整，

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Elizabeth Gretz（我的手稿编辑）技巧丰富地精炼了这些文字。

我同时也从几个慷慨的研究赞助者那里受益。国家科学基金支持了我的早期理论论文，埃尔哈特基金资助了关于印度和东欧章节的研究。国家人文基金提供了研究基金，使我能够在1989～1990学年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呆上一年，那里被誉为学者的天堂。另外还有两个研究中心授予我访问学者的特权：在1991年，位于普拉格的查尔斯大学经济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中心；在1992年，新德里的印度统计研究所。

最后，我衷心感谢 Nese Kanoglu, Feisal Khan 和 Jason MacInnes，因为他们热情的研究协助；感谢 Gautam Bose, Helena Flam, Shubhashis Gangopadhyay, David Lipps, Sanjay Subrahmanyam 和 Peter Voss，因为他们的有益讨论以及在人际协调方面对我的帮助；感谢 Herbert Addison, Colin Day, Peter Dougherty 和 Jack Repcheck，因为他们富有成果的建议以及在我工作的各个阶段给予的鼓励；感谢匈牙利 Gallup 的 Robert Manchin，德国 Allensbach 研究所的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和捷克共和国的公共观点研究所的 Ivan Tomek，因为他们帮助我处理了一些重要的调查；感谢 Ruth Wallach，因为他帮助我将斯拉夫语言资料翻译过来；还有 Joan Walsh，感谢他的绘图工作。

1994年11月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